

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

第八期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目 录

抗日战争以前温州学生运动的回忆.....胡景城(1)

从闽北到浙西南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回忆片断.....张金发(15)

温中学生运动侧记.....林荣澄(28)

有关黄尚英同志的两封信.....(34)

“五九”在温州(转载).....树 榛(37)

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

第 八 期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目 录

抗日战争以前温州学生运动的回忆.....胡景城(1)

从闽北到浙西南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回忆片断.....张金发(15)

温中学生运动侧记.....林荣澄(28)

有关黄尚英同志的两封信.....(34)

“五九”在温州(转载).....树 榛(37)

抗日战争以前温州学生运动的回忆

胡 景 璩

(一)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我在温州中学高中部二年级读书。当时，国际上德、意法西斯严重威胁世界和平，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伐，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仍然全力进行反共内战，加重了民族危机。上海出版的《新生》、《读书生活》和《世界知识》等大量的进步刊物，在同学中流传。它们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影响很大。温中原来有个校刊叫《明天》，是学术性较强的综合刊物，从一九三四年起，逐渐增加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内战的内容，渐渐变成政治性较强的刊物。取名《明天》是向往着光明的未来的意思。《明天》是十六开的铅印本，每一学期出版一、二期，全部由同学投稿，由学生自治会学术股主编。这一学期，我被同学们推选为学术股股长，负责编这刊物。我的同学马大恢（书法家马公愚的儿子，现在美国），赵瑞虹（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柳泽萃（已亡故）帮助我编辑。这时候，有两个从国民党牢狱里释放出来的人，从青田来到温州，一个叫朱一岩，四川人，一个叫徐国恭，青田人，他们住在小客栈里，通过同学胡方金的关系，要找进步的青年。这位同学为我们介绍，他们就来找我们，跟我们谈了很多革命道理，宣传中国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有出路。他们告诉我们要很好利用学生自治会开展活动，但仅仅利用这合法组织是不够的，本身还要组织起来才能发挥作用。这个组织不要搞得太红，最好是以读书会的形式，把进步同学组织起来。这些话，我们都很听得进。当时我们都年轻，没有仔细询问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坐牢，对他们的身份、职业也没有搞清楚。现

在回想起来，这两个人肯定是革命者，或许是共产党员。当时朱一岩曾根据共产党员黄鹄烈士的事迹，写了中篇小说《W·莉》，在同学中秘密传阅。一九四九年解放后，这篇小说曾在《浙南日报》上连载。

一九三五年五月间，几个要好的同学经过酝酿，组织了一个“野火读书会”。取名“野火”，是引用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意，以表示我们决心革命的意向。第一批会员除赵瑞虹、马大恢、柳泽萃和我之外，还有徐贤议、项淑贞、吴性慧、张莲仙、刘宗、李金声、张可仙（已亡故）、孙绍奎（孙平）、马骅、金竹如、胡方金等。暑假里又发展了一些会员。三五年下半年学期开始，因一部份同学毕业离校了，野火读书会就以温中高三年級的张可仙、孙绍奎、马骅、洪彦霖、孙经邃和我为主，开展活动。到了“一二·九”前夕，读书会员发展到六十多人，其中还有翰墨林文具店的两个印刷工人。夏巨珍、林爱雪、郑尧、张古怀、许美崇等，都是会员。读书会经常集会，阅读进步书刊，交流思想，纵谈国事，思想非常活跃，讨论问题毫无顾忌，还常常举行郊游。当时对我们的思想影响较大的是鲁迅、茅盾、巴金的小说，以及《新生》、《大众生活》、《生活知识》、《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杂志。其中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影响尤大，这几位作家与这些杂志，确实对一代人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野火读书会”刊出“野火壁报”，每周出刊，每期都轮流在高中部、初中部先后张贴，看的人很多，后来同学们要求油印，每期出油印本二百多册，收回成本费两个铜板，有预订的，也有另售的，每期都很快卖光。“野火读书会”反对学校所推行的一套法西斯的教育制度：穿军服，打绑腿，剃光头，搞军训，灌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反动思想。这样，逐渐引起学校当局的注意。当时的校长叫张镐，他认为我们这些人不安分，要读书会停止活动，甚至威胁要开除张可仙，但我们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继续活动。

“野火读书会”不但在温州活动，而且在外地也有了发展。

在上海，赵瑞虹、项淑贞两人在大夏大学念书，柳泽萃在暨南大学念书，他们与陈其襄（生活书店襄理）、郑嘉治（在上海搞英文翻译）、朱一岩（在同济大学附属工厂工作，“八·一三”以后参加义勇军，据说在对日作战中牺牲）一起组织了读书会。吴性慧在浙江医专念书，在杭州也组织了读书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徐贤议，在南开大学读书的马大恢，也分别组织了北平与天津的读书会。上海组织的读书会还与我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发生关系。各地读书会经常把当地的有关情况告诉温州，上海还经常寄来进步的刊物。

“野火读书会”是学生的群众组织，传播了革命思想，团结了一批进步的同学，为温州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二）

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前夕，中华民族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之后，又指使汉奸殷汝耕、池宗墨（这两个人都是浙江平阳人）组织了冀东傀儡政权，北平岌岌可危。而国民党政府却认敌为友，对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一再“围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反动政策，扩大内战，将大好河山拱手让人，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一二·九”运动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爆发的。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北平学联迅速寄来了快邮代电，使我们得知北平同学为了要求政府抗日，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的真相，“野火读书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宣读了北平学联的快邮代电，会员莫不义愤填膺，立即决定将快邮代电抄成大字报张贴。同学们知道了“一二·九”运动的真相，全校都沸腾起来了。紧接着，我们筹备成立温中学生救国会，组织宣传队，编写宣传资

料。同时，分别跟瓯海中学的魏忠和联立中学的同学联系，准备筹建温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大家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非常认真紧张地工作。

当时我们都是些十八、九岁的青年，思想单纯，满以为自己一片爱国热情，一定会得到学校当局和政府的支持，但事实上我们与北平的同学一样，遭到了一系列的阻挠和迫害。

十二月十三日，也就是北平“一二·九”运动发生后的第四天，温中学生救国会开成立大会，全校同学都来参加。事先，我们邀请全校教师来指导，校长张镐、总务主任薛乐之拒不参加，许多教师不敢来，只有许志行、虞明素、陈逸人、陈铎民几位教师来参加。他们虽然在会上没有发言，但前来参加已是对我们的有力支持，在当时说来是很难得的。事后，许志行先生还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了数月的铁窗之苦。当时，我们还是力争学校当局的支持，拿着宣传计划去找张镐，他却大发雷霆，诬蔑我们受人利用，图谋不轨，要我们停止活动，否则将采取严厉措施。薛乐之则召集全校同学训话，说什么“学生只能规规矩矩读书，不能在校外活动，胡适之先生说：‘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你们要是真爱国，只有老老实实念书”。少数思想顽固的老师也来压制我们，一位国文教师，年已半百，向来满口道德文章，居然动手揪了作宣传工作的初中同学的耳朵；一位英语教师，平时雍容儒雅，这时竟动手把宣传队的旗帜、灯笼都践踏了；学校还派两位体育教师监视同学，甚至采取特务手法，在我们晚上开会时剪断电线，制造混乱。

但学校当局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使我们气馁。参加救亡运动的同学日益增加，宣传队照常出发宣传，热心的市民自动给我们拿桌搬凳，搭临时讲台，还给我们送茶水。人民的支持，给我们增添了不少的勇气。

十二月十七日下午，温州学生联合救国会正式成立。在中山公园广场上，温中、瓯中和联中三个中学的同学一千多人到会，温中

附小、瓯江小学（现为广场路小学）和第九小学（现为瓦市小学）的高年级学生也来了一部份。会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宣言，然后举行游行，一路高呼口号。最后，队伍向国民党专员公署前进，要向专员许蟠云请愿。

事先，我们议定了请愿的两点要求：第一，要求政府对日绝交；第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带着这两点要求，队伍浩浩荡荡向专员公署前进。许蟠云早已知道消息，在专员公署的门前挂起一条大横幅，上写“欢迎爱国学生合理建议”几个大字，他身穿兰长衫黑马褂，对我们笑脸相迎，连声说：“同学们辛苦了”。队伍进入专署院子，排列在大厅内外，我们陈述了抗日的意见，递了请愿书。他含笑表示：这两个要求地方政府无权决定，但他一定负责将这意见转呈南京蒋委员长。接着，开始了又臭又长的长篇演讲。说什么中国人一盘散沙，一定要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才能上下一心，精诚团结。中国兵不精，粮不足，抗日不能取胜，一定要长期准备，而且竟扯到“航空救国”，要学生出去劝募，捐献飞机；又大谈积谷防饥，贮足军粮；教训学生要“读书救国”，说学生只要埋头用功读书，国家大事自有蒋委员长安排；还大弹一通“安内攘外”的老调。冬天昼短夜长，许蟠云东拉西扯一番，已是暮色苍茫。学生队伍从中午集合，开会，游行，站队，又饥饿又疲劳，我们几个领队的，连中饭也没吃，许蟠云这一番“疲劳轰炸”，实在叫人吃不消。好不容易等许蟠云讲完了话，我们几个人匆促地交换一下意见，觉得没有必要拖下去，就决定整队回校。

当晚，学联会负责人召开了会议，认为温州国民党当局虽然没有像北平那样暴力镇压，而是搪塞欺骗，却一样都是消极抗日，本质上并无区别。而我们所提的两点要求，许蟠云以地方政府无权决定为由，推给蒋介石，实际上不起作用。我们一定要收集几条地方政府可以办到的抗日要求，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并且估计到同学虽已初步发动，但要使运动持久，还要做许多工作，决定深入到市民与郊区农民中去进行宣传，同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提出新的请愿

要求。为了避免宣传队挤在一起，决定三个中学分片进行：温中负责中片和近郊；瓯中负责西片；联中负责东片。而且，为了避免与学校当局冲突而增加阻力，强调必须遵守课堂纪律，一切活动都在课余进行。当时，我们印了许多通俗的小传单，如“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广田三原则”、“什么叫冀东自治”、“什么叫法西斯”等等带有政治启蒙作用的资料，广为散发，以配合我们的口头宣传。

十八日起，我们将宣传队分成更多的精干小队，深入到码头、作坊、近郊去活动，而校内表面很平静，同学们规规矩矩地上课。学校当局很高兴，说我们这些学生五分钟热度已过，不足为患了。张镐为了分散学生的注意力，筹备庆祝元旦的联欢晚会，张镐还准备亲自登台清唱平剧，学校里一派“升平”景象。

我们紧张地活动了十来天，从群众中收集了许多意见，归纳成以下三点要求：

第一是拆东洋堂。“东洋堂”是店名，座落在南大街纱帽河路口（即现在的温州针织三厂），是中国人的房产，租给日本商人滕末开设百货商店。当时滕末已经回国，商店也关闭了。那时温州正开拓路政，大街两边的店面房屋各向后退五尺。所有的房屋都奉命拆让了，只有这“东洋堂”，仅仅因为是日商租的，政府不敢去拆。这间店孤零零地突出街心，各方的意见最激烈，认为拆不了东洋堂，是国家民族的耻辱。拆“东洋堂”，地方政府完全有权，而且完全应该这样做。



抗日战争以前，温中学生自治会学术股负责主编的进步刊物“明天”。

第二是没收汉奸殷汝耕、池宗墨的财产，这两个人在平阳的产业，是在温州专员公署管辖下的，这一条也应当做到。

第三是抵制日货，禁止贩卖日货。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我们打听到许蟠云在县政府，就集中队伍到县政府去找他。这一天学生约一千多人，西郊码头工人和木筏工人近千人，还有二千多市民，陆续参加到请愿队伍中来，人数约为四、五千人。从钟楼到县政府门口（现在的人民广场门前十字路口到广场中段），里里外外，人都站满了。

政府当局也早有戒备，专署保安大队倾巢而出：东洋堂门前一个连守着，还架起机枪；一个连守专员公署；县政府门口也有一个连。步枪都上了刺刀，如临大敌。许蟠云不但不再笑脸相迎，而且拒绝出来接见，由秘书出来敷衍。我们非要许蟠云出来不可，采取“静坐示威”的办法，队伍守在县政府门前不走。相持了一个多小时，许蟠云摆着铁青面孔出来了，一开口就指责：你们学生为什么带着无知的“暴民”来捣乱。我们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政府采取抗日的行动，要他当场宣布拆除东洋堂，没收殷、池二汉奸财产和抵制日货三条要求，要许蟠云立即答复。我们每讲完一条，群众一齐鼓掌，反应很强烈。群众要求最强烈的是要立即拆除东洋堂，许蟠云还想搪塞，说道：“拆东洋堂关系外交大事，出了乱子谁负责”！站在队伍前头的女同学林爱雪，高声回答：“我们学生负责”！这一下群众鼓掌更热烈了，队伍高喊：“中国人自己作主”！在这慷慨激昂的愤怒的群众面前，许蟠云面如土色，不敢以武力弹压，最后只得吞吞吐吐地说：“允许政府交涉后决定”。我们的目的基本已经达到，队伍就回来了。（到了抗日战争开始前，才将东洋堂拆除）。

从这一天开始，温州城区宣布戒严，晚上禁止宣传，便衣特务守在校门口，监视同学的活动。校长张镐也在门口拦阻，并且宣布，如出去宣传，人身安全概不负责。同学们仍旧冲了出去，进行宣传。学校并决定提前学期考试，又将试题先透露给学生，以诱使同学放弃抗日活动，参加期考，提前放寒假。但去参加考试的同学寥

寥无几，只有三十人光景，绝大多数同学反对提前放寒假。接着，学校当局又决定伙房停止开伙，迫使同学离校。一月十日，学校当局贴出布告，开除胡景域、张可仙、马骅三个人的学籍。同学闻讯即集中礼堂开大会，要求学校当局收回成命。这时，保安大队即包围礼堂，在学校里到处搜寻我们三人，同学们掩护我们，没有被抓去。有一位名叫孟中经的同学，平时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救亡活动，这时忍无可忍，当场与保安大队姓王的大队长辩论。——可见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促使处在中间状态的同学也进步起来了。

第二天午前，张镐亲自带了便衣特务到学校将我和张可仙逮捕，还搜捕马骅。马骅闻讯后，就藏到他姑母家去了。同一天下午，许志行老师也被逮捕。我们都因爱国有罪，成了囚犯。

同时，学校又宣布退学廿四个同学，现在记得起来的有孙绍奎、孙经邃、郑梅迪、葛寅生（戈德）、叶令艮、郑之光、庄鹤生（后参加新四军，已牺牲）、殷体昆（殷汝耕的侄儿）、林荣澄、夏巨珍、洪彦林、许美崇等。

这样，历时二十多天的温州“一二·九”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我们当天被关在专署门口的牢房里，不给饭吃，看守的士兵同情我们，偷偷地替我们买了几个烧饼充饥。当夜十点钟，由军事法庭庭长王智竹连夜审问，当然问不出什么名堂，只训斥我们：小小年纪，被人利用。勒令我们立即离开温州，不准再在温州活动，实际上是被驱逐出境。半夜里，我们被送到门口传达室，许志行先生则被关进拘留所。第二天同学们又集中，包围了专员公署，家属也出来活动。王智竹说：“学生可以交保，教员留着审查”，这样，由我的舅父姚止戈将我保了出来，同学们又找到县前头的一家小商店，出了钱雇他作为保家，将张可仙也保了出来。

我们出狱以后，“野火读书会”开了个会，决定仍旧继续活动，并在被退学的学生家长中展开工作，要求学校收回成命。温州不少士绅和知名人士都站出来为学生说话，如浙江图书馆馆长、

经学大师孙诒让的儿子孙廷钊，地方士绅许冶荪，都出来与张镐交涉，学校当局只得允许被退学的廿四个同学回校，他们大部分仍回校读书。我于当年古历十二月廿四（一九三六年一月）被警察押上广济轮船，到上海我母亲姚平子处，她那时在民立女中教书。张可仙也到了上海他父亲处，其父在上海美专工作。

许志行先生被关押了三个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吴文祺拍电报给张镐，提出质问，著名历史学家周予同教授也写信责备张镐，迫于舆论的谴责，同学们又去找到铺保，许先生才被释放出来。现在，许老师已年逾八旬，据说原在上海师范学院执教，已经退休，

“一二·九”运动期间，我们与党在组织上并没有直接联系。我们所知道的党的主张、口号，都是从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上所透露中看来的，也遵照党的主张而行动的。当时，刘英、粟裕同志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已经到了浙闽边，我们只是听说有红军来了，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与游击根据地的党组织接上关系，是以后的事。

（三）

张可仙是青田人，他的父亲与上海的全国救国会负责人，后来被称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是同乡，二人很熟悉。当时，章乃器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经理，他父亲想托章乃器替可仙找个工作，于是将温州的情况告诉了章乃器。这样，章就约可仙和我去谈话，向我们仔细了解温州学生运动的情况。一九三六年四月初，他第二次约我们去谈话时，北平学联的负责人江凌也在座。江凌正准备去无锡召开全国学联的筹备会议，章乃器将我们向江凌作了介绍，建议让我们参加无锡的会议。江凌同意了。在清明节前，我们到了无锡，记得北平来的是江凌和林法（陆瑾）等人，杭州、上海、南京，天津等地都有人去，代表共十多人，张可仙和我就作为温州的代表。会议以春游为掩护，在风景区太湖、梅园等处开会，共开了三天。用的都是化名，我们也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在代表中，我

们两个是年纪最轻的，大家喊我们小张和小胡。

在这次筹备会上交流了各地学生运动的情况。这时正是“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都遭到了镇压，但是都采取各种方式保存力量，团结青年，进行半公开甚至秘密的活动。北平是采用“民族先锋队”这种组织形式，上海是搞秘密的学生组织，我们在会上介绍了温州学生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活动的情况。

会议决定：（一）五月份召开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还要起草章程。以北平、上海二地为主，负责这一工作。（二）准备出版不定期的内部的会报，介绍学运情况，交流工作经验。还约定今后互相联系的办法。

全国学联筹备会的联络地点在上海，我住的地方贝勒路，也是联络地点之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和四川北路一个咖啡店，也是碰头的地点。上海一位姓夏的代表负责同可仙和我联系，彼此只知道姓，不问名字。

章程草案起草以后，由我刻钢板印好，让夏代表带去分发。各地与我们互相联系的信件，都用粥汤密写，收到后用碘酒一揩，显出字迹来。我将外地的来信显示，抄录下来，交给夏代表。温州洪彦霖、孙绍奎与我们之间的通讯，也用这种密写法。

这时，吴玉章同志在巴黎主持出版的《救国时报》也搞到手了。我们通过轮船上的水手和生活书店的陈其襄将《救国时报》带到温州。从此，党的主张、政策就直接与读书会的同学见面了。这时，《大众生活》已经被迫停刊，金仲华主编的《永生》还在继续出刊（在上海出版）。五月，我和可仙根据温州同学提供的材料，写了一篇《“五九”在温州》在《永生》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发表，笔名叫“亦如”。马骅也写了一篇《“五九”在温州》在《生活知识》上发表，笔名叫树榛。《永生》同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一样，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刊物，也可以说是《大众生活》的继续，在这上面登出温州学生运动的情况，对温州学运的鼓励是很大的。

五月，全国学联在上海法租界法国公园旁边的一座别墅里举行成立大会。据说这座别墅是李宗仁的产业，当时空着，借给学联使用。广西来了代表二人，工作人员四人，是坐飞机来的，西装革履，住很阔气的旅馆，对外则说是做生意。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范围，与蒋介石有矛盾，李、白为了自己政治上的需要，标榜抗日救国。当时，全国只有广西一省的救国会可以公开活动。学联开会的地址和广西代表团的阔气的排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白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大家议论：“广西学联代表被李、白利用了。”他们很幽默地说：“有人利用抗日，也是好的。”实际上，恐怕是学联利用了李、白作掩护，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

到会的代表共计四、五十人，代表了二十多个地区，杭州的代表是浙江大学的施平，北平、上海、太原、西安、郑州都派了代表，我和可仙仍作为温州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交流了各地的情况和经验，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出版会刊《全国学联会报》。我记得这会报出过好几期，介绍各地学运情况和宣传抗日救国。

正在全国学联开会的期间，温中学生为了纪念“五九”，召开了全校纪念大会，会上有五个同学讲话。洪彦霖是学业成绩优异的高材生，在同学中威信很高。他在会上慷慨陈辞，批判蒋介石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林爱雪也讲了话，会后，组织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由孙经邃带领，走上大街，高呼口号，在市民中影响很大。这次游行之后，温中同学准备在五卅组织更大的示威游行，进一步发动群众。这时读书会依旧存在，并且在活动，不过不称“野火”，光叫“读书会”。读书的内容也有了改变，以前还读点理论、文艺的书，这时，完全侧重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研究，对国民党政策的批判、阐述我党对时局的主张，几乎成为政治性的团体了。纪念“五·九”运动的领导核心，仍旧是“一二·九”运动中的进步同学。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全国的学运都受到国民党的压制，各地学

生组织都只能半公开甚至秘密地进行活动。温中学生这一次纪念“五·九”的群众性运动就很突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注意。五月廿九日，即“五卅”前夕，他们就动手镇压，温中学校当局宣布开除了洪彦霖、孙经邃、林爱雪、郑梅迪等四人的学籍，而且立即加以逮捕，起先关押在温州，随后押送到杭州关在小车桥监狱。可见这次镇压措施，是浙江省政府和省党部策划决定的。他们被关押了一百另一天才保释出来。在四位同学被开除的同时，学校又勒令四十八个同学退学。我记得的有庄鹤生、蔡翠云、郑伯永（已亡故）、仇雪清、葛寅生、郑尧、夏巨珍、李方成、黄古芬、俞素英、何锐、陈昌明、吴国夫、徐顺荪、薛大勋、姚宣（已亡故）、叶琛、殷体良等，但学生仍不罢休，继续罢课、请愿。国民党政府又一次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段，将军队开进温州中学，同学们则手拿童子军棍，在校园春草池畔与军队发生冲突，叶琛还夺了士兵的一条步枪（后来交还了）。

暑假期间，我们又发出了“为温州中学当局无理开除四十八名同学告全县同胞书”，而且进一步联络同学家长，特别是串连被开除被退学的同学的家长谴责政府和学校当局，扩大社会影响，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次工作做得更加广泛，如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书记长张强，从来不支持学生，这次因为子女被退学，也站出来为学生说话；瑞安的李冶荪则带了几位学生家长到南京、杭州，向国民党政府控告张镐，列举张镐办学不力，教育腐败等劣迹，要求将他撤换。结果，国民党当局撤了张镐的职，由杨成勋继任温中校长，被退学的四十八个同学也被允许仍回校读书。

一九三六年九月，被关在杭州的四个同学也保释出来了。洪彦霖、孙经邃先后到上海，马骅、夏巨珍、郑尧等也先后到了上海。洪彦霖靠翻译为生，孙、马、夏、郑则在读书。温州中学的读书会，以叶令良、林荣澄、郑之光等同学为主，继续活动，孙绍奎在温州同他们发生联系。我们通过陈其襄开办的温州生活书店，将进步书刊寄给孙绍奎；我们还经常写信给他，介绍全国各地的有关情

况，孙绍奎则通过叶令艮等来指导温中的学生活动。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孙绍奎通过杨进（林怡）的关系与党组织发生联系，使温州学生与党组织直接接上了关系。杨进是平阳人，当时他的妻子蔡翠云，在温中初中部念书，也是读书会的会员。这年十月，由蔡翠云介绍，杨进与孙绍奎见了面。这以后，温州的学生运动便由党直接领导，学生中也逐渐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在他的统治区，仍旧摧残抗日爱国运动。当时在上海的全国救国会出版一份机关报《救亡情报》，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虽已被捕，但《救亡情报》仍旧继续发行。一九三七年一月，温州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鉴非为了摧残青年学生的救国活动，指使特务分子搜查叶令艮、郑之光在马宅巷租用的房间，搜到《救亡情报》和少年先锋队队歌以及一些进步书报，叶、郑即被指为共产党，被扣留在永嘉县党部，追究《救亡情报》的来源，又抓去了孙绍奎。孙绍奎说明这报纸在上海是公开发行的，是胡景域托生活书店带来给我们看看的。他们都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特务又找温州生活书店的陈其刚（陈其襄之兄）去谈话，陈其刚推说经手书报极多，不能一一拆看，不知内容，也就出来了。

与《救亡情报》有关而被捕的还有曾绍文和何承恩。他们当时都是上海同济大学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学生，寒假回家，去探望同学郑之光，不料郑之光的住处已被监视，特务盯梢追踪到他们住的小客栈，搜查行李，搜出《救亡情报》，曾、何也被捕。

叶龄银、郑之光被扣留了一个多星期，孙绍奎、曾绍文、何承恩三人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因《救亡情报》确是救国会公开发行的报纸，别无证据，国民党当局只得把他们释放了。

《明天》第六期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被学校当局禁止，下半年改名为《新路》，由郑伯永主编，仍坚持出版，宣传抗日，读书

会仍存在。但由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只能分散秘密活动。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中共闽浙临时省委派黄先河（何畏）为白区工作团团长，到了温州，四月孙绍奎入党，又发展了夏巨珍、郑梅迪等，五月间，孙绍奎写信给我们在上海的同学说：“店中生意兴隆，缺少伙计，请介绍几个人来”。孙经邃、马骅、林夫都先后回到温州，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温中同学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四）

抗日战争开始前的几年，正是红军挺进师在浙南进行三年游击战争的时期，温州的学生运动是全国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份，实际上，与红军挺进师的游击战争起了呼应、配合的作用。

这阶段的学生运动有如下的特点：

（一）学生运动一开始就在党的政治主张影响下开展起来的，也就是在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与抗日救国主张的号召下发动起来的。所以，当中共闽浙临时省委派人来到温州时，很自然地接受了党的直接领导。

（二）通过斗争，培养了大批干部。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后来大部分入了党，很多人成了党的骨干。

（三）抗日救亡运动不但发动了青年学生，而且初步与工农相结合，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的群众运动的开展，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四）温州学生运动的道路是正确的，初期虽然比较幼稚，但在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而且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前一直在坚持，没有间断，当时在东南各省是有影响的。而一九三六年纪念“五·九”的学生运动，冲破国民党的压制，当时在全国也是不多的。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于杭州。

从闽北到浙西南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回忆片断

张 金 发

“再见，闽北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中央根据地，经闽入浙向北进发，在浙江庆元与龙泉八都的几次战斗中，缴获了敌人许多枪支和物资。我们红五团二营四、六连两个连，奉命护送这些枪支和物资到闽北根据地。当我们返回寻找主力部队时，在江山铁路边上被敌人截断了去路，只好撤回闽北根据地坚持斗争。从此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当时，我才十七岁，在六连当一名小司号员。一九三四年的冬天主力部队北上途中，受到蒋匪帮绝对优势兵力的阻击，返回闽北寻找我们。

一天下午，我们忽然接到司令部通知：立即到司令部与主力部队会合。同志们听到消息，乐得快要流出眼泪来，首长们终于把我们找到了。夜里，在崇安岚谷古楼坳头，与司令部和主力部队胜利会师了，指战员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到处燃起了篝火，大家手拉着手围拢来，有的互谈着战绩，有的交流作战经验，冬夜的山村顿时沸腾起来。我们似离别多年的女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心里感到无限亲切和温暖。

“同志们，辛苦了！”粟裕同志和刘英同志过来与连队首长握手，又向战士们挥手问好。首长们经过近几个月的艰苦作战，比前稍瘦了些，可是仍然那样矫健，精神十分饱满。我们发现几位首长的手上包扎着绷带，知道是挂彩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大家把首长围起来，关心地问：“首长，你的手……”“不要紧，被狗咬的！”首长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下子就把大家逗笑了。